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64

进退之间：清代江南文人的隐逸思想及形成原因

——以苏州状元石韞玉为例

孙铭泽¹ 董粉和¹

(¹苏州科技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9)

摘要: 隐逸思想在江南文脉的延续中意义重大。以清代苏州状元石韞玉为研究对象, 通过梳理石韞玉的个人生平、交际网络与文学创作, 结合地域特色及时代特征, 可以清楚地揭示石韞玉的隐逸思想及其形成原因, 进而探讨乾嘉时期江南文人隐逸思想的时代特征及其文化内涵。石韞玉在宦海浮沉十八年之后, 归隐乡里, 通过掌教书院、藏书治学、募劝赈济等方式, 实现自己隐逸理想。以石韞玉为中心的案例分析表明, 清代江南精英阶层, 已经很好地调和了“经世”和“遁世”之间的仕隐矛盾, 并重构了传统隐逸思想的内涵。

关键词: 石韞玉、隐逸思想、江南文化

石韞玉作为乾、嘉、道时期的著名文士, “为文贯穿古今, 尤长于经世之学”^[1]。石韞玉的隐逸思想, 飘然有魏晋之风, 也体现了儒家“君子固穷”的达观之态, 更有他自己在经世济民宏愿之外的人生哲思。石韞玉对于隐逸思想的实践, 折射出了清中期政治生态和文坛风气的变迁, 也展现出清代江南精英阶层隐逸为表, 济世为里的生存智慧, 揭示了隐逸文化在江南文脉中的独特意义。

一、石韞玉的个人经历

石韞玉(1756-1837), 字执如, 号琢堂、竹堂、竹堂居士、竹翁、归真子、绿春词客、西磧山人, 又号花韵庵主人, 亦称独学老人, 清苏州府吴县人, 生于清高宗乾隆二十一年, 卒于清宣宗道光十七年, 享年八十二岁。石韞玉祖籍丹阳, 其曾祖石政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逃难至苏州定居。祖父石邦楨, 父石熙载。石韞玉少时即聪颖过人。其人文武双全, 才华横溢。法式善赞其曰: “大廷封策名第一, 上马提戈下马笔。见者诧为飞将军, 岂知渠是苦吟身。”^[2]石韞玉于乾隆四十四年中举, 经历十年不第后, 于乾隆五十五年考中进士, 在殿试中被特拔置第一甲一名, 授翰林院修撰。

石韞玉自乾隆五十五年入仕, 至嘉庆十二年告病归田, 为官十八载, 清心自守, 忧国忧民。石韞玉历任翰林院修撰、福建乡试正考官、提督湖南学正、日讲起居注官、四川重庆府知府兼护川东道、陕西潼商道、山东按察使署布政使。嘉庆十二年, 部议革职。仁宗念其军功, 赏给翰林院编修、国史馆行走。旋以足疾请辞归田。

石韞玉归田后, 勤勉治学, 乡中多有善举。他先后延席杭州紫阳书院、金陵尊经书院、苏州紫阳书院, 还在扬州书局校勘《全唐文》, 在苏州纂修道光《苏州府志》。石韞玉晚年退隐林泉, 时常扶危济贫, 又协同乡贤士绅建设乡里, 在乡中多有善举。道光十一年(1831)淮北遭灾, 许多灾民流落苏州, 他募劝赈济; 道光十四年(1834)苏州遭遇水灾, 他亦是不顾年迈劝助赈济。“凡乡中有善举, 公必出为领袖, 始终

[作者简介]

[1]孙铭泽(1999—), 女, 汉族, 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2]董粉和(1964—), 男, 汉族, 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无倦”^[3]，堪称乡贤典范，有忠厚长者之风。

《清史列传》中评价石韞玉：“生平律身清谨，未达时，见得罪名教书，即焚之。家置一纸库，名曰孽海。然性和易近人，不立厓岸。所为文贯穿古今，尤长于经世之学。诗破除唐宋门户，援笔立成。”^[4]著有独学庐诗文集，卒年八十二。

二、石韞玉的隐逸思想

石韞玉是清代苏州状元，也是江南文人的代表。其诗文著作《独学庐诗文稿》，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较好地展现乾嘉道时期的文化背景和特色。今人从《续修四库全书》中辑出石韞玉的《独学庐文稿》（包含有《独学庐初稿》、《独学庐二稿》、《独学庐三稿》、《独学庐四稿》、《独学庐五稿》、《独学庐余稿》、《独学庐文稿附录》诗稿二十七卷文稿二十一卷）及《独学庐尺牋偶存》二卷点校出版。这其中，石韞玉的许多诗文都是围绕着“隐逸”的主题展开的。在诗文中，他抒发了人生的慨叹、政治黑暗的困苦、儒家“君子固穷”的清高自矜、思乡之情和林泉之思等情怀，并探讨了隐逸哲学的实践性。

（一）石韞玉的清吟自赏

基于对传统隐逸文化的理解，石韞玉所追求的是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淡泊自守、安贫乐道的隐逸生活。他在《西磧山人歌》中描绘了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山人无事终岁读，架上有书七千轴。食有杞菊无膏粱，衣有薜荔无纨縠。一壶酒，一张琴，入林不密山不深。门前落叶秋不扫，山人踪迹无人寻。”^[4]

在石韞玉的仕宦生涯中，外放重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上任重庆知府之前，石韞玉担任过翰林院修撰、福建乡试正考官、提督湖南学正、日讲起居注官，并没有脱离出一个传统文官的政治眼光和升迁道路。但是在嘉庆五年（1800），石韞玉任重庆知府后，他逐渐开发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也更加关注到了百姓的疾苦、吏治的腐坏、朝廷的无能，更加深刻地认识了“道”和“治”之间的关系。

石韞玉在重庆知府的任上，勤勉有为，昼则马上追贼，夜则坐穹庐下治文书，三更方就枕，五更又拔营，寒暑不替。嘉庆五年（1800）春，白莲教军进犯重庆。石韞玉率部依据嘉陵江等有利地形，防守重庆，终使白莲教军败溃退走。石韞玉还与长寿县令余钰考察地形，商讨构筑长寿新城。在为政之余，他去往东川书院考课学子，关心地方文教事业。身处巴山楚水，远离京师、故土和家人，周旋在官民军吏之中，石韞玉对人生有了新的体悟：

“仕宦至二千石，古人以为荣名。今我忽忽不乐，毋乃不近人情。男儿堕地有志，此意真如耳鸣。独知不能共喻，他人安得相争？我生四十有五，平生有志无成。文不能调台鼎，赞襄密勿承明。武不能握兵符，风雷号令施行。坐守一州斗大，消磨秋蟀春鷓。何似拂衣归去，江湖放浪余生。杞菊一庐偕隐，鸥波万里同盟。”^[4]

石韞玉表示自己欲法古人，拂衣归隐，不问朝堂，放浪余生。这就是江南文人“在世超然”的隐逸文化。嘉庆七年，石韞玉在京家人回到原籍。但石韞玉依旧留在蜀地为官，征讨平乱。嘉庆八年春，石韞玉作下了《暮春书怀》二首，抒发自己的郁郁之情和归隐之心：

“自徙戎马蜀江湄，欲觅封侯苦数奇。春色渐随樊素老，宦情惟有杜鹃知。望云鹤已乘轩倦，上竹鱼犹縊壑迟。回首五湖烟水阔，黄金何日铸鸱夷？”

当时解褐换朝绅，转烛光阴十四春。清佩曾趋三殿直，劳薪遍历九州尘。官逢邓禹应相笑，赋拟扬云未逐贫。闻道钧天张广乐，可知世有谪仙人？”^[4]

此外，对于家乡的思念，也构筑了他退隐归乡追求的一部分：“贝锦多销骨，金丹不驻颜。近来新乐府，惟谱《念家山》。”^[4]乡关何处？归期何在？“日落风起，群鸟乱飞。陟彼崇邱，遥望故扉。浮云如盖，罨我庭闹。京华虽乐，不如南归。溪有荇藻，山有蕨薇。薄言采之，可以疗饥。家有板舆，胜于骖騑。金貂烂然，不如莱衣。平沙迢迢，密雪霏霏。嗟哉游子，境与心违。”^[4]石韞玉对于归乡隐居的向往，使他构建出了隐逸生活的美好蓝图。他在自己的诗作《喜达里门》中畅想道：“他乡虽好不如归，喜趁晨光叩故扉。万卷藏书成敝帚，十年应举尚初衣。自怜道路风尘老，渐觉朋友慰藉稀。差胜洛阳苏季子，闺中尚有妇停机。”^[4]

嘉庆十年，石韞玉进京觐见仁宗时，适逢元旦佳节。节日中，处处都弥漫着喜庆团圆的氛围，但石韞玉却心生惆怅。他回顾平生，感慨万千：“人生百岁期，今朝我过半。盛颜既蹉跎，桑榆日已盱……倦鸟恋山樊，劳人思里闾。”^[4]嘉庆十二年，石韞玉辞官归田，再不出仕。

（二）石韞玉的交友酬唱

石韞玉在和友人的交往酬唱中，也经常表现出自己的归隐之心。嘉庆八年，合州知州龚际美罢官南归，

石韞玉为他作诗送行：“载石方知陆绩贫，一琴一鹤仅随身。共游宦海风涛里，心羨先登彼岸人。”^[4]石韞玉对于友人归乡隐逸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他感慨自己身在宦海波涛不断，身不由己。嘉庆十年，石韞玉归葬自己原配夫人蒋氏，在家乡休养期间，他为友人蒋业晋题了《天远云归图》。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江南士人对于隐逸文化的理解和构思：

“世事茫茫何日了，白云唯有归山好。君不见，天上卿云五色深，萧索轮囷世共宝。几时霖雨到苍生，回风牵率空颠倒。何似闲云一叶轻，山中自悦无人黜。我亦身如岭上云，初心愿守青山老。一朝出岫本无心，欲归未归自烦恼。世人未解云何心，犹羨从龙甚夭矫。观君此图忽怅触，话到故山归计杳。松菊柴门亦已荒，劳人难卜归迟早。丁宁重与白云期，一片野心当自保。”^[4]

嘉庆十二年(1807)，石韞玉在山东按察使任上，因案被劾。嘉庆皇帝召其回京城，同僚孙星衍在济南汇泉僧舍为石韞玉饯行时，石韞玉即席而作了一首应酬诗，定下泛舟五湖、共话松菊之约：“十年鞅掌苦劳薪，暂得今朝自在身。无恙云林应住佛，有情鱼鸟尚依人。霜前落叶先辞树，风里飞花不恋茵。话到故山松菊好，归田相约五湖滨。”^[4]

这种闲云野鹤的隐逸生活，对于身在官场，不得自由的石韞玉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石韞玉常与友人慨叹命运无常，畅想归隐林泉的宁静生活。从山东到京城后，石韞玉和故友法式善相会。多年不见，物是人非，石韞玉感慨良多。他也为法式善题扇三首，诗云：

“采菱菱花寄所思，绿云一朵堕湘湄。故人若问依消息，笑指游鱼上竹时。

绿蓑青笠古元真，误向桃源二问津。满地江湖归未得，临渊尚有羡鱼人。

我本烟波旧钓徒，十年梦想在莼鲈。秋光正好人犹健，一片归心向五湖。”^[4]

此外，石韞玉与同年张问陶、表亲黄丕烈、王芑孙、袁枚等人都有诗文往来，还与沈复交好。在与友人的交际之中，石韞玉加深了对于隐逸文化的理解，也更加确信了自己对归隐生活的向往。石韞玉晚年与袁枚交往的信札内容，也佐证了石韞玉对于隐逸思想的实践性和行动力。

石韞玉在自己的抒怀之作中，对隐逸文化的理解是层层递进的，也是多方面的，兼具哲学思考和实践意义。而在退隐归乡之后，石韞玉结诗社，掌书院，贤达乡里，治学藏书，编纂方志，为江南文脉的传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隐逸生活并没有让石韞玉消沉潦倒，反而使他的生命更加圆满。

三、石韞玉隐逸思想的形成原因

环境的熏陶对于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石韞玉作为清苏州府吴县人，生长读书皆在苏州。石韞玉在二十九岁赴安徽担任幕僚之前，除了几次短暂的北上应举的游历以外，一直在苏州流连。石韞玉祖籍丹阳，其曾祖石政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逃难至苏州定居，传至石韞玉，已有四代。苏州是江南文化的中心之地。江南的隐逸文化由来已久，始于魏晋，唐宋时期形成其地域特色，经济重心南移后进一步完善。明清之际，江南市镇经济发达，文脉兴盛，文人众多，“市隐”文化发达。苏州的民俗风貌和地区文化，都对石韞玉的成长和人格塑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苏州故土的文脉之盛、风物之雅、林泉之清、隐居之逸，都影响着石韞玉的文学创作和仕途选择。

此外，隐逸观的实践本身就包含着对不同的伦理矛盾的深刻思考，包括仕隐矛盾、儒道冲突、生存危机、知行合一、自我塑造等课题。其隐逸思想的形成，受到了当时的政治环境、石韞玉的个人经历、苏州地区的文化氛围和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影响。

(一) 苏州地区的隐逸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丰富的隐逸思想和较为明显的出世趋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隐逸思想，是去功利化的。它提倡人们与世俗功利相决裂，投身更广阔的天地，返璞归真，追寻人生的价值和宇宙的哲思，劳苦身心，淡泊自守，构建一个自由的、诗意的、天然去雕饰的精神乐园。在清代的苏州地区，这样的隐逸文化尤为盛行。苏州风物繁盛，文化底蕴深厚，文化氛围浓郁，文人雅士众多。江南地区文脉昌盛，文化活动频繁。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石韞玉从京城会试归来，与众好友结碧桃诗社，以诗会友，追慕风雅。诗社成员包括石韞玉、张邦弼、赵基、王芑孙、张诒、沈起凤、沈清瑞七人。石韞玉晚年归田居家，还集结吴中旧友重聚，结成问梅诗社，吟诵切磋，乐陶陶然。问梅诗社作为道光年间苏州地区较有声望的诗社，是文人雅士们抒怀诉情，一展才华的聚会之所。其中，张吉安、王芑孙、吴翌凤、孙星衍、表亲黄丕烈等人俱在。亲友重聚，赏四时之景，乐林泉之乐，吟诗赏花，赏景赋诗，都让石韞玉的归隐生活更加闲适愉快。问梅诗社的活动多为怀古祝祷，如为东坡庆生、赏菊忆陶等，具有高雅的文化旨趣，在苏州当地也颇具影响力。道光十一年(1831年)，在重修沧浪亭，倡建吴郡名贤祠的时候，石韞玉还亲系赞语，

端书勒石。^[5]

另外，苏州园林中所包含的隐逸文化，也深深地影响了石韞玉。苏州作为江南的繁华之地，山水秀丽，人杰地灵，城中园林众多。当隐逸山水的文人思想融入了苏州园林的建造之中时，苏州园林也就代表了大隐于市的文人态度。苏州古典园林中，就蕴涵着深厚的中国传统隐逸文化审美内涵。苏州园林在方寸之间叠山理水，构天人之合于市井之内，正是江南文人在疏离政治和与世俗社会保持联系之间努力保持微妙平衡的现实投射。

苏州园林众多，许多退休官员和富商都会选择在苏州营造园林，颐养天年。苏州园林历史悠久，明清时期的名园层出。据学者研究，明代苏州园林 271 处，数量为全国之首。清代，园林也有 130 余处。^[6]苏州的园林文化是渗透进了苏州的城市建设里面的。清人沈朝初《忆江南》词云：“苏州好，城里半园亭”^[7]。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的苏州古典园林，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隐逸。园林是隐逸意识的物化，也是隐逸意识的表达。园林是隐逸山林的思想和城市生活的完美结合，是文人雅士避世交游的理想场所。

苏州园林的造园立意之中，包含着宏大丰富的隐逸思想和审美。苏州古典园林将建筑、山水、花木高度融合，化自然与人和谐统一，借助诗文绘画进行审美点化，创造出融多种意象群的“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既是诗意栖居的地方，又是隐逸文化的中心。^[8]苏州园林的造园旨趣中，蕴含着文人园林“隐逸”的思想特质，彰显讲求借物抒情、以少胜多、以山水为题、以形写神。在有限的城市宅园空间中，将寄情山水的文人意境寄托于与闹市一墙之隔的咫尺山林之内，将有限的实体空间扩大到广袤的山水意境之中。栖居于城市，栖居于自然，栖居于山水，栖居在自己的精神之中，是隐逸哲学的回归。^[9]

苏州是园林的城市，也是文人雅士的集聚之所，是文化艺术的流行之地。苏州园林的主人，或是无心功名的名贤隐士，或是遭受贬谪的退休官员，或是狂放洒脱的吴中名士，或是崇尚风雅的文人富豪。苏州的城市和苏州的园林是融为一体的。苏州园林的隐逸哲学也流传在苏州整个城市之中，冲击到周边地区，乃至流布整个江南。在这样的园林城市中成长起来的石韞玉，也对“隐逸”有更多的接受和思考。

（二）石韞玉的个人志趣

石韞玉生性聪颖，喜交友，善治学，嗜藏书，工诗文，爱风月，爱好广泛。苏州《紫阳书院志》载：“韞玉少工诗文，能诗能文，诗文双优。与同人结碧桃诗社，所作未尝无风云月露之好，晚岁一归平淡。性喜旷朗而恶拘伪，既无官，身同闲云野鹤。韞玉善谈，喜与客饮。所居有五柳园、晚香楼、花韵庵、鹤寿山堂等胜，朝夕读书其中，日有常课。课不完，不入内室。至老不变。生平以才思敏捷称，为人清谨和易。”^[10]这样的生活态度，是与刻板的清代官场相悖的。

石韞玉爱好治学藏书，擅作诗，文通古今，自成一派。法式善曾赞曰：“石琢堂廉访诗，格高律细，胎息唐贤。”^[10]石韞玉的一生著作宏富，类别众多。仅集部书便有《独学庐诗文集》、《独学文存》、《独学庐外集》诗稿二十七卷、文稿二十一卷，《读论质疑》一卷、《尺牋偶存》二卷、《微波词》四卷。此外还有《竹堂类稿》十六卷，《花韵庵诗余》、《花韵庵词余》各一卷，《花间九奏》九卷（九个短剧，分别为《伏生授经》、《罗敷采桑》、《桃叶渡江》、《桃源渔父》、《梅妃作赋》、《乐天开阁》、《贾岛祭诗》、《琴操参禅》及《对山救友》，皆为纯粹之文人剧），《红楼梦》（传奇十折），《多识录》九卷，《袁文笺正》十六卷、补注一卷，并曾辑《全唐文》、《明八家文选》等。

这其中，石韞玉愿意以一个状元文人的身份进行戏曲创作并不常见。石韞玉的文人剧笔法细腻，戏剧冲突合理，独白真切。他选择用戏曲创作的形式，借戏中人物之口，表达自己对奸佞的蔑视，对尊严和荣誉、对人生理想的坚守等等。戏曲的欣赏和创作，对石韞玉来说，是一种人生排遣寂寞，抒发感怀的方式，也是表达自己的理想和热爱的途径。石韞玉在功名利禄之外，也保留了自己雅趣逸兴的热土。

石韞玉性嗜书。在入翰林院供职后，他开始大量购书藏书，勤勉治学。在《凌波阁藏书目录序》中他自述道：“余家本寒微，先世藏书甚少……迨进士及第之年，则已读书七千卷矣……其后稍稍购求，二十年来又得此四万余卷，凡此皆节衣食之费而置之者也。”^[14]独学庐就是他建的藏书之所，也是他“独学为心”的治学之所，是他心灵隐逸的虚空之处。

在藏书治学之外，石韞玉还喜好篆刻，尤擅隶书。李放说他：“工隶书，铁笔古雅。”石韞玉自己则言道：“我生爱铁笔，制作追皇古。帝羲臣颉不可攀，降从八体寻规矩。残字共宝鸿都经，阙文莫补岐阳鼓。”^[14]又言：“我少习鄙事，爱古忘愚蠢。穷年琢山骨，肱列同璜琮。不解嘲石癖，稍异供书佣。抚此触素好，恍闻谷音跽。珍如金万镒，袭以锦十重。岂云雕虫技，壮夫所不容？”^[14]乾隆五十八年（1793），石韞玉又突发奇想，将传世名篇《兰亭序》三百二十四个字，打乱顺序，颠倒其文，重新组合，成就了一篇新的序文，世称《颠倒兰亭序》，并钩摹上石，立碑于绍兴兰亭，流传颇广。

总的来说,石韞玉的个人喜好和兴趣更偏向非功利性的一面:自洽、自足、自娱。将“独学庐”作为自己书斋的名字,也恰恰说明了石韞玉对于独处和治学的需求。不管是篆刻、作诗、编撰戏文,还是藏书治学,都于爵禄无用。但石韞玉更加偏好的,就是生活中这些“偷得浮生半日闲”的乐趣。这也符合了“隐逸”的旨趣。

(三) 政治环境的压抑

石韞玉主要的为官经历集中于乾、嘉二朝,但在他为官时期,清王朝的政治生态并不乐观。乾隆皇帝晚年昏聩,重用和坤,贪图享乐。朝廷专权横肆,吏治腐败。嘉庆初年,朝政混乱。清高宗驾崩后,嘉庆皇帝迅速向和坤及其党羽发难,借机整顿朝堂,并下旨广开言路。一时之间,朝臣欢欣,报国志士无不踴躍满志。但是,嘉庆皇帝并不是真的能广纳贤言,虚心受谏。嘉庆四年(1799)八月,石韞玉的同科好友、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直言谏议,批评嘉庆新政,“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似通而未通,吏治欲肃而未肃”。^[11]八月二十五日,成亲王永理将洪亮吉的谏议呈送皇帝,皇帝阅后大怒,当即经内阁发下谕旨问罪洪亮吉,将洪亮吉革职,交刑部,“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最终戍发伊犁。^[12]洪亮吉的遭遇,使得许多锐意改革之士对朝廷心灰意冷,纷纷选择明哲保身。政治的黑暗使人无可奈何。在洪亮吉死后,石韞玉还写下了《更生居士挽辞》,表达了自己对于洪亮吉的钦佩和同情:“吾友更生翁,平生好岸异。官为柱下史,封章无路致。手草万言书,高论罔识忌。投诸执政门,藉达登闻使。上言补袞职,下言慎名器。臚列众公卿,一一寓风刺。剖心志无他,批鳞视如戏。圣明日方中,处士敢横议?”^[14]

另外,在清代官场中,因言论获罪并不局限于谏言,普通的诗词文章也有可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牢狱之灾。清代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从文章中截取文字,罗织罪名,打击异己,稳定统治。文字狱使得许多汉族文人身获重罪,甚至性命不保,全家受到牵连。清朝著名的文字狱有戴名世案、徐骏案、朱方旦案等。

清代的文字狱不论从数量、还是规模、持续时间、牵连的广泛都要超越前代。这其中,有夷狄之辩的关系在。虽然在清朝,满人的汉化程度很深,但是在强调“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儒家思想中,满人始终是被排斥的对象。因此,为了巩固皇权统治与强制思想领域的专制,文字狱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达到了高潮。^[13]清代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使得整个时代的文化都笼罩在一种黑暗压抑的氛围之中。高发的文字狱使无数文人灰心丧志,有许多人避世隐居,为求平安自保;也有人专注考据,埋首于故纸堆中,乾嘉学派就此壮大。隐逸避世,在当时整个文人群体中形成了一股潮流。

事实上,在清代,许多汉族文人的消极心态都是由政治和民族等因素引起的。一方面,清王朝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许多汉族文人都有一种“遗民心态”,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出现了一大批缅怀明朝、痛斥满清政权、拒不出仕隐居避世的汉族文人。另一方面,在清代的官场上,很长一段时间都存在着扶满排汉的政治倾向,汉族文人地主们始终在地位上低于满清贵族们。这也会引发汉族文人群体的不满。

此外,政治的黑暗也影响到了民生安稳和百姓生存。在石韞玉赴蜀地上任期间,他就曾亲眼目睹了挣扎在白莲教和官府之间求生的百姓生活之疾苦。特别是官府的军队,作风之恶劣、搜刮百姓之彻底、吏治之腐败,都让石韞玉受到了重大的冲击。但是,他却不得不接手这样的局面,平定叛乱,打击白莲教,并维持朝廷的形象。嘉庆四年(1799),石韞玉路过七盘岭时,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写下了《七盘岭记事》:

“夜宿宁羌州,朝登七盘岭。峻板崎岖高入云,过关卅里无人影。昨宵驿吏向我言,官兵半千关上屯。如何今日驱车去,匹马只轮无觅处。鬍头童子草间出,戟手指天向余说:连日关头曾列营,旌旗蔽日刀枪鸣。朝来忽闻有贼信,顷刻仓皇拔营遁。我闻国家设兵以卫民,如何贼犹未至兵先奔?道旁一叟向余泣,但怨官兵不怨贼。官兵避贼如避雷,贼去百里兵始来。贼来焚掠有余烬,官兵所过扫地净。佩刀不斩贼人头,但入村舍屠猪牛。战马无刍又无豈,中田群行麦苗秀。村居十室九无人,绣户文窗摧作薪。承平将吏工谐笑,不习戎韬习文貌。忽闻贼去心肠宽,整顿弓刀迎上官,上官问贼曰小丑,小丑至时大兵走。”^[14]

兵丁成灾,吏治腐败,欺上瞒下,阿谀奉承。而白莲教不灭,匪患不绝,百姓困苦无助,求救无门。贼匪之祸未平,吏治苛政之猛令百姓更加绝望。“官兵所过扫地净”的现实颇具讽刺意味,也是清廷政治腐败的延申。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石韞玉尽管有勤勉爱民之心、经世济民之才,也是有心无力,疲乏不堪。事实上,在重庆担任知府期间,石韞玉为官清正,处事有方,多有贤名,广受赞誉。嘉庆九年,四川大计群吏,石韞玉名列一等。《勤政殿召对记》记载:嘉庆十年四月十一日,余以卓异人员引见,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用。……上问:“汝在四川几年?”臣奏:“臣在四川先后七年。”上问:“汝在勒保军营办事,所办何事?”臣奏:“凡勒保答奏及一切文武文移,皆是臣办。又擒获贼匪,亦由臣审问供词。”上问:“贼匪也是你审,究竟他们因何造反?”臣奏:“贼以邪教煽惑愚民,蓄志已久,意在聚众抢掠。”上云:“有人言官逼民反,果否?”臣奏:“皇上圣明鉴察,贼匪蔓延五省,即如四川一省,扰及四十州县,岂有如许州县无一好

官之理? 实在多是好作乱之人。”上云:“两者都有, 贼也可恶, 官也有不好的。”……臣奏:“大臣们全仗圣明训示。”上微笑颌之。臣遂叩头辞出。”^[14]

石韞玉在川蜀一地, 为政勤勉, 事必躬亲, 既有文官之才, 也有具备良好的军事才能。但尽管如此, 在现实政治的打击和官场的黑暗面前, 石韞玉依然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有苦难言。他无力改变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现实, 也不能对统治者直言痛弊, 指出朝廷官逼民反、吏治腐坏的危难之局。

中国传统文人大多都有着经世济民、安定天下的崇高理想。但是, 在高远的志向与自我期许之外, 中国传统文人也天然地拥有另一个选择, 那就是隐逸。他们会为宇宙发出无穷的哲思, 会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挣扎反思, 或是在目睹了现实社会的黑暗和无奈之后, 选择避世归隐。石韞玉作为一个汉族传统文人, 具有经世济民和隐逸淡泊的两面性。他在困顿黑暗的现实政治面前, 选择了践行自己的隐逸理想, 是出于对时代问题、现实困顿、个人需求的综合考量。

四、结语

石韞玉的诗文写作, 在保留现实关怀的同时, 具有一种浪漫主义风格。其中对于采菊东篱、泛舟五湖的隐逸生活, 长期怀有一种浪漫的想象和向往。在许多观点中, 隐逸的追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济民、仕宦进取的儒家思想相悖。但事实上, 隐逸的实践, 能够在几千年之中长盛不衰, 就是因为这一思想实践的现实意义在不断被更新。隐逸观的实践, 从遗世独立、内化分离、身在江海而心在魏阙的痛苦挣扎, 逐渐走向了“知行合一”、自我探寻、穷达通变的精神滋养。江南地区隐逸文化的发展, 折射出了江南士人群体对于政治生态和时代危机的回应。

石韞玉对于人生的追求, 一方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思想的影响, 留恋山石林泉, 视自然山水为精神家园, 使得他的诗作行文清丽, 飘逸超然; 另一方面又继承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 退居田园而关怀苍生, 慎修己身, 投身地方的文教事业, 推动江南地区的文化繁荣与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隐士”“逸民”往往具有较高的精神追求, 强调个人的存在和独立, 以隐逸之举求高洁之志。《后汉书》有言:“或隐居以求其志, 或回避以全其道, 或静已以镇其躁, 或去危以图其安, 或垢俗以动其概, 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 憔悴江海之上, 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 亦云性分所至而已。”^[15] 隐逸林泉山水, 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方式, 而是中国文人独特的一种和谐的追求。在清代的江南文人群体中, 隐逸生活并非全然的超脱和遁世, 而是一种“在退隐中进取”的独特模式。这种隐逸思想对于江南文脉的传承和江南文化的繁荣, 都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

- [1] (清) 佚名. 清史列传 [M]. 王钟翰,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2] (清) 法式善. 法式善文学家族诗集 [M]. 多洛肯,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 [3] (清) 陶澍. 陶澍全集, 六, 文集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
- [4] (清) 石韞玉. 独学庐文稿 [M]. 董粉和,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 [5] 杨镜如. 紫阳书院志 1713-1904 [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6.
- [6] 张新沂. 中外建筑史 [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9.
- [7] (清) 顾禄. 清嘉录 [M].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
- [8] 刘卫平. 苏州古典园林的隐逸文化审美意象 [J]. 前沿, 2008, 9: 78-81.
- [9] 苏畅作. “咫尺山林”与“壶中天地”——园林意境感知与实体空间共构 [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3.
- [10] 钱仲联. 清诗纪事 [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4.
- [11] 赵尔巽. 清史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77.
- [12] 陈金陵. 洪亮吉评传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 [13] 庾向芳. 近代史学转型视野下的民国清史学 1912-1949 [M]. 上海: 三联书店. 2021.
- [14] 睦骏. 石韞玉年谱 [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 [15] (宋) 范晔. 后汉书 [M]. 陕西: 三秦出版社. 2004.

Between the politician and the hermit: The Seclusion philosophy of Literati in

Jiangn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Formation Causes

— Taking Shi Yunyu, the Top Scholar from Suzhou, as an Example

Sun Mingze¹, Dong Fenhe¹

¹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Abstrac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dea of seclusion in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Jiangna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aking Shi Yunyu, the top scholar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Suzhou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sorting out his personal life, social network and literary creation, and combining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times, it can clearly reveal Shi Yunyu's "seclusion" thought and its formation reasons,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seclusion thought of Jiangnan scholars during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 After eighteen years of ups and downs in officialdom, Shi Yunyu retired to his hometown and realized his seclusion ideal through teaching at a private school, collecting books and studying, and raising funds for relief. The case analysis centered on Shi Yunyu shows that the elite class in Jiangn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had well reconcil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ngaging in the world" and "retreating from the world" in terms of officialdom and seclusion, and reconstructe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seclusion thought.

Keywords: Shi Yunyu; The Seclusion philosophy; Jiangnan culture